

块数据驱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以深圳市N区治理实践为例

涂志明 杜志章 何良海 朱毅*

【摘要】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正在经历由“单兵作战、条块分割”转向“多元融合、协同治理”的构建过程，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复杂科学管理范式转变。本文在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支撑重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理论框架，并以深圳市N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探讨块数据驱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结果表明，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愿景目标，构建各类治理主体、治理客体的形态关联，打通政府部门条数据，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运行系统中，实现“一基五柱”块数据城市数字底板，建立“同心圆价值链：要素链—责任链—指挥链—共治链”，重塑协同治理业务流程，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高效性、精准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治理；块数据；知识图谱；数据赋能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2.12.0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这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创新思路，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②深圳市作为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的地方，不断探索科技赋能社会治理创新，构建以块数据为核心的

* 涂志明，江汉大学讲师；杜志章，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何良海，深圳市南山区网格管理中心；朱毅，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编号：19ZDA113）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②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协》2020年第19期。

基层社会治理平台,^①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一核四圈同心圆”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贡献了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

一、问题提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居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理念 and 行政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结构不断分化重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格局沉积、认同信任差异明显,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一) 基层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需要系统调整

基层工作面临着“条块分割、协同不力”的难题。自2013年我国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工作以来,服务对象不断增加,由于网格事项准入制度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大量原属于职能部门的工作事项逐级下压至街道社区,最终下沉到网格,网格化工作由最初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转向“城市综合治理”,人少压力大。一方面,基层工作事项不断增加,工作边界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职能部门配置了大量“条线”服务管理人员,未能统筹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应。

居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不强、积极性不足,满意度极低。目前,区、街道仍然是社会事务的主要管理者,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以至于顾此失彼。社会市场多元力量参与深度不够,部分社区居民、物业公司等参与积极性不强。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环境卫生、安全生产和法律服务等民生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逐渐显现,原有的基层网格化管理工作出现了“社区拼命干、群众一边看”的现象。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人员组织、治理事务、财政超载和治理资源错配等问题挑战。^②为此,需要深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新时代发展要求不匹配的痛点堵点,从治理愿景目标、治理主体的分工协作等入手,认真研究复杂适应性社会系统^③特征,重建社会治理组织、机理和控制模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各方主体权利和责任,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平等协商、有序参与治理过程,系统性解决政府部门条块协同、社会力量多元融合的问题。

(二) 急需新的治理手段提升纵横联动工作效率

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社会治理要素存在底数不清、情况不

① 陈刚:《块数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科技论坛》2015年第4期。

② 李岩:《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推进》,《新视野》2021年第5期。

③ 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明、责任不实等问题。一是流动人口信息仍停留在基层上门采集，“人户分离”较为普遍，很难采全、采准，底数不清；二是房屋地址缺少规范，公安、民政和资规等多部门各管一段，地址描述难以统一；三是企业注册地址不准确不规范，市场监管力量不足，存在利用虚假地址注册躲避监管的问题；四是部分跨部门事件责任主体不明确，彼此推诿，处置效率低下。

社会治理模式已逐渐实现从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型，网络化技术治理方式已成为实现合作协同治理的新走向，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复杂科学管理范式转变。因此，需要分析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借助数字技术记录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痕迹化^①互动过程，以数字化变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职能重塑、流程再造、业务协同、效能提升，促进综合治理服务相互衔接和协同联动，推动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精细化管理转变，^②弥补社会治理高成本、低效率和低响应的现实不足。

二、理论框架：科技支撑重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是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之间构成复杂的网络化结构，按照职能分工和利益分配协同合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建立起以政府及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网络治理结构。

（一）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杨述明认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由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构成；^③姜晓萍和阿海曲洛认为，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④杨雄认为，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在于完善政府治理、推进多元“共建共治共享”体制形成，注重新技术手段与传统文化、社会力量相结合；^⑤高雪认为，技术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变革从“数据赋能——社会互动——治理重构”三个不同阶段引发治理理念、治理能力、社会关系、治理空间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变化；^⑥孟天广和赵娟认为，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

① 向静林：《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指向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第8期。

② 李建宁：《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审思与创新》，《领导科学》2021年第14期。

③ 杨述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五种基本构成》，《江汉论坛》2015年第2期。

④ 姜晓萍、阿海曲洛：《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理论探讨》2020年第3期。

⑤ 杨雄：《关于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若干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

⑥ 高雪：《技术嵌入下的基层治理变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20年。

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从整体看，当前，学界对社会治理问题的探讨更多地停留在机制设计层面，而对其所处的信息时代背景关注较少。^①社会治理体系中需要嵌入数字技术，它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切入口，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基础。

按照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包括制度体系、组织体系、评价体系、运行系统和信息系统五大组成部分（如图1）。五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一体，形成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与互相融合的复杂网络社会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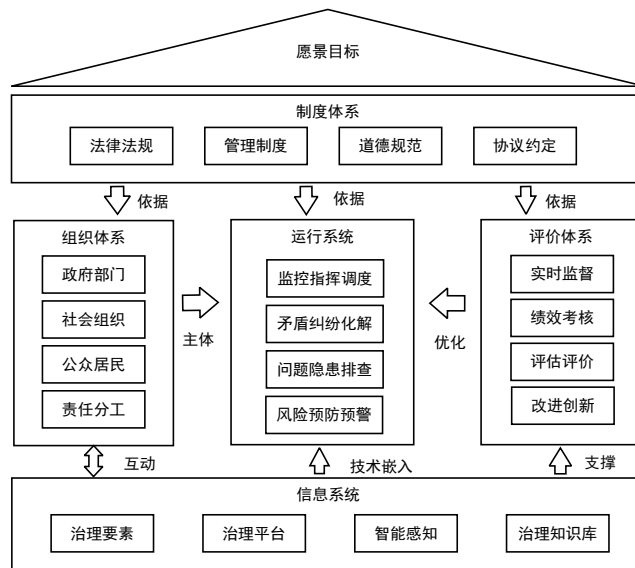


图1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愿景目标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共同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

制度体系是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愿景目标下，治理主体达成共识并依照其内容行事的一系列制度准则和行为规范，是社会治理实践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参照，包括宪法、民法典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各种行业、社会组织的章程、规则和管理规定，村（居）民委员会制定的乡规民约，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制度体系是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骨架和命脉，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三治融合确保社会和谐有序运行。

组织体系是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的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②作为治理主体确定由“谁”来治理。它包括参与社会治理的党组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居民等多元主体，以及各主体间通过权力、义务和利益分配形成的权责关系和协作关系。多方联合组织所形成的自建网络是一个多元网络，其治理主体类型更加丰富，包括居民、物业服务单位、服务单位等，更讲究协同治理，强调自主性而非责任主体。

① 孟天广、赵娟：《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理论建构与治理体系》，《电子政务》2018年第8期。

② 姜晓萍、阿海曲洛：《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理论探讨》2020年第3期。

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实现人类社会、信息空间、物理世界三者的全面连通与融合，^①完成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将科技智能嵌入运行系统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进而实现标本兼治和持续有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②

运行系统是一种全新的协同治理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态里，人、事、设备、信息、流程、空间和时间之间有机联系在一起，按照组织生产和服务的效能需要调配调动资源，组成纵横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开展维护民众整体利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的治理活动。

评价体系是按照社会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检验评价、考核监督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效能，负责评判监督治理结果好坏，改进优化各系统，完成新一轮的系统循环和螺旋式提升。

（二）社会治理体系数据建模

大数据技术是社会治理体系获得科技支撑的物质基础，是统筹协调多元主体资源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治理体系数据建模就是在信息空间中还原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关系，把数据作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要素，围绕治理目标构建各类治理主体、治理客体的形态关联（如图2）。业务数据化是指信息系统将社会治理要素标准化与数字化，聚集成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中的大数据；数据智能化是指将社会治理规则转换成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嵌入社会治理运行系统，数据、算力和算法驱动信息高效流转，形成人机融合共治的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治理指标化是指评价体系衡量治理过程和治理成效的指标项参数，反应偏差、优化提升治理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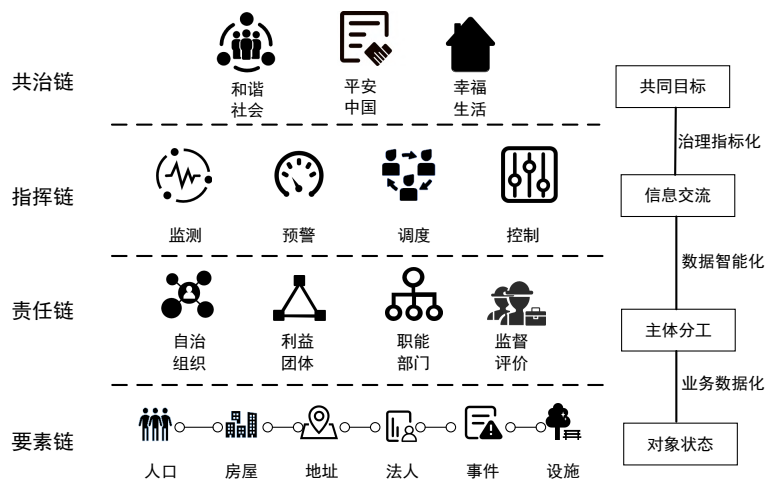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治理的组织、机理、控制和数据模型

① 翟书颖、郭斌、李茹等：《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框架》，《大数据》2017年第6期。
 ② 徐浩然：《提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8期。
 ③ 牟春雪：《城市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9年。

在数据资源整合共享方面,块数据将分散在各业务部门的人口、房屋(地址)、法人、事件、设施等的社会治理要素(条数据)按照管理层级关系封装到市、区、街道、社区、网格、建筑物、房屋等管理单元,形成多维关联的数据总和。

块数据是大数据发展的高级形态,^①在信息系统中按照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层层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一是利用知识图谱技术以“实体—边—实体”的方式来描述真实世界的事物及其关系,将有高度关联聚集关系的治理对象群组构成要素链;二是按照部门的事项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把参与治理的主体关联形成责任链;三是建立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运行机制指挥链;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平安、幸福、和谐的社会共治链。

围绕共同治理目标愿景,打造党建引领的同心圆价值链,建立数字化时代的高响应组织模型,构成复杂社会网络治理体系。运用块数据驱动社会治理业务管理闭环,链接责任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和治理相关部门,压实基层治理块责任,实现全周期管理,强化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构建“同心圆价值链:要素链—责任链—指挥链—共治链”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三) 块数据驱动赋能协同治理

块数据的价值在于挖掘社会治理大数据多层、多维的内在关联和关联规则,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主动性、时效性、科学性。^②传统政府治理思路大多以问题为导向,即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事后应对模式,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常常表现得较为被动。^③块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变革是应对快速变化的协同治理必然需要,全面推动治理主体之间的高效协调,^④实现整体性、系统性、精准性和智慧化的公共治理,打造整体智治的政府。

整合政府部门和基层社会治理要素数据,建设块数据智能底板,实现各种社会治理协同场景的数学建模,将模型映射到虚拟空间,用块数据管理做到压实块责任形成合力,用块数据赋能实现精细化治理,从而在社会治理中做到感知预警、风险预判、及时预防,高效排除社会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如人工智能感知摄像头自动识别垃圾堆积、沿街晾挂、占道经营、违章停车、异常行为、人员异常聚集等行为事件,运行系统中的块数据智能底板平台会根据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将可疑事件信息自动推送给网格员或者执法人员,实现派单作业、精细治理。

①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块数据2.0:大数据时代的范式革命》,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64页。

② 余敏江:《整体智治:块数据驱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行政论坛》2020年第4期。

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与优化路径》,《中州学刊》2020年第2期。

④ 高雪:《技术嵌入下的基层治理变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20年。

三、实践路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深圳市N区以“网格化+块数据”为支撑，编织社会治理的“智慧大脑”，建立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网格管理监督、网格巡办队伍、街社工作平台和社会多元力量为团结合力的“一核四圈同心圆”模式，旨在通过让数据从分散走向汇聚，让服务从被动走向主动，让管理从粗放走向精细，让治理从政府单一主导走向社会多元共治，^①来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一）重构块体系，实现“横到边、纵到底”

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构建权责明晰的组织体系，确保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推进全周期跨部门协同治理，解决好基层社会治理中资源不均衡、协调能力不足、反应不及时等问题。一是建立“1（区）+8（街道）+101（社区）+1610（网格）”管理体系。建设事件统一受理、分拨指挥体系，开展跨部门、跨层级事件统一受理和分拨实体化运行工作，实现全区事件第一时间分拨处置，解决基层协调难度大及效率低下的问题；二是建立权责相匹配的基层治理机制。厘清网格员职责定位，科学划分网格，以事定格、以格定费等手段，加强网格化管理改革工作，制定可上可下、可增可减、奖优罚劣的制度。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员到基层，培育一支新型网格队伍群开展基层走访工作，让基层治理问题得以及时发现和处置；三是建立事件分级分类、分拨处置机制。制定了306项网格事件清单和29项即采即办清单，重塑科层条块关系的责任链，建立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清单，明确“报到”主责部门、配合部门及各部门负责的工作事项。

（二）整合块数据，实现“底数清、情况明”

城市数字底板是数字孪生城市的基本构成，是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重点管理服务对象，能够真实反映城市的客观现实存在，数字空间逐渐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治理主体全面掌握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实现线上线下高效联动、协同共治。^②

打造“一基五柱”^③块数据城市数字底板，形成社会治理要素链。一是以统一地址为基，以人口、房屋、法人、通信、事件为柱，构建“一基五柱”社会治理大数据库，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块数据底板；二是政企共建，节约政府治理成本。与市水、电、气公司合作，将每月用水、用电、用气数据与房屋和企业进行关联，为加强房屋和企业精准管理和服务工作提供

① 唐双捷：《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

② 孟天广：《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机制与路径——兼论“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的双向驱动》，《治理研究》2021年第1期。

③ 朱耿、朱占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探索与启示》，《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20年第11期。

支撑。购买物业公司协同治理服务,解决花园式小区人员居住和商业楼宇企业入驻信息采集,改变以往网格员“门难进”的问题。

目前“块数据”初步打通了政府30多个部门108类、1.49亿条数据,完成204万人口、55万家企业落到了3.4万栋楼房、97万房屋之中,并压实关联到相应的网格员、社区专干,建立了房屋的“责任档案”,有效地提升社会治理资源应用能力,让基层真正掌握资源、应用资源。

(三) 压实块责任,实现“职责清、目标明”

按照实体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模式构建区级城市运行系统,实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双向沟通和良性互动,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消除部门间管理机制的碎片化,减少管理层次、拓宽治理幅度。^①

一是全面整合数字化城管、12345政务热线和网格治理平台等6个系统的事件信息,实现区级分拨平台受理各类事件,避免重复登录与上报。构建以网格主管部门统筹监督、条线部门专业处置、街道综合整治、社区网格全面排查为体系的指挥链,规范事件发现、分拨、处置、反馈等环节的责任主体、工作流程,形成群众诉求“一网统管”,全流程闭环管理。

二是完善网格事项处理流程,建立考核评价监督机制。重新梳理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标准、考核评价方法,建立责任倒逼机制,将网格工作纳入行政绩效考核范围,压实工作责任链。基层发现解决问题能力大幅提升,2021年受理各类网格事件和居民诉求35万宗,比2020年同比增长4倍,97%以上的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三是推动企业法人精心服务。利用快递公司62万条企业的地址信息与块数据比对清洗,确定了近40万家企业的经营地址,开展短信、电话等企业服务,为重点企业、重点人才开展人力资源讲座、公益招聘、精准邀约、政策解读、创新论坛等服务工作。税务、网格部门联合制定纳税企业实地经营巡查工作,检查监督2000多户纳税企业,既解决了税务部门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又有效地督促了企业开展合法经营。

(四) 驱动块共治,实现“齐动员、共合力”

党组织发挥政治引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②开展“行政一动员”双重治理模式,^③连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建立“一核四圈同心圆”的工作机制。“一核”指的是基层党组织,起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第一圈网格管理中心,负责网格化管理监督;第二圈组建网格员巡办队伍,负责

^① 谢斌、李瑜普:《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机遇与挑战》,《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② 李晓社:《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及实现路径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黎梦瑜:《党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国槐路社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20年。

网格事项办理处置和执法；第三圈街道工作平台、社区微工作平台，负责指挥调度基层治理力量；第四圈社会多元力量，包括业委会、居委会、楼栋长、企业、物业公司、群众。围绕党组织内核形成四级同心圆共治链，打造多元创新共同治理的新格局。

二是群众共建，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发动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企业以及业主、楼栋长、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了一支4万多人的基层社会治理生力军，累计处置各类突发事件1000宗，其中20%是由快递员、楼栋长处置。对接“i深圳”等平台，增加公众“随手拍”等功能，让社区居民群众能够通过科技手段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四、总结与思考

作为广东省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点，N区以“网格化+块数据”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总结其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工作有两点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构建了“同心圆价值链：要素链—责任链—指挥链—共治链”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整合“网格化”与“块数据”两种技术治理模式，在治理机制体制上有效解决了“条块分割”问题，在治理手段上更加智能化，实现了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二是技术治理与协同治理的结合是破解整体智治的突破口。数字技术嵌入协同治理过程是精细治理的内在逻辑，“分级分类管理、责任分块”是协同治理的基础保障，其应用有效解决了多元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边界模糊”问题，实现了从“人海战术”到“精准监管”的转变。

当前，我国各地政府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大数据、区块链、数据中台的技术治理方法得以应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建设了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与N区信息化基础条件相似，复制“块数据”经验可行、方便。推广工作主要抓住两点：一是在现有的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按照治理要素制定责任管理体系，整合与治理要素相关的各部门信息来源渠道并关联融合，例如：建立人口信息宽表，包含公安、卫健、教育、民政、人社、医保、社保等十多个部门。压实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和权力边界，形成完善的块数据治理体制机制。二是梳理跨部门业务协同的规则、模型和指标，将其嵌入治理对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例如：商事主体的登记、服务、监管、信用、注销全过程涉及近百条治理规则。需要改变传统单向度的治理模式，切实扭转社会治理上的被动局面，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治理。当然，在推广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块数据涉及多个部门的核心信息，无疑对数据的核采、使用、共享和存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监管工作难度，推广实践

中政府一定要注意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工作，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和计算算力的突破，数字技术嵌入的精准治理模式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要注意多技术的融合、平台建设以及人才建设等现实问题。

总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实困境，块数据驱动业务协同模式，能够有效减少部门线，统一归口为一根线。只有做到时间、空间和资源的统一，才能有效提升各部门的协同力和执行力。

Block Data Drives Innovation in Community-level Soc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Governance Practice in District N of Shenzhen City

TU Zhiming DU Zhizhang HE Lianghai ZHU Yi

[Abstract] At present,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undergoing a construction process from “individual combat and segmentation” to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mode to complex scientific management paradigm. Based on relevant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kes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practice of N District of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driven by block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vi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s the goal, the form correlation of various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governance objects is constructed, the data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s connected,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s embedded into the social governance operation system, the digital base of data city block “one base and five pillars” is realized, and the “concentric circle value chain” is established. “Factor chain—responsibility chain—command chain—co-governance chain”, reshaping the business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lock Data; Knowledge Map; Data Empowerment

（责任编辑：杨婷）